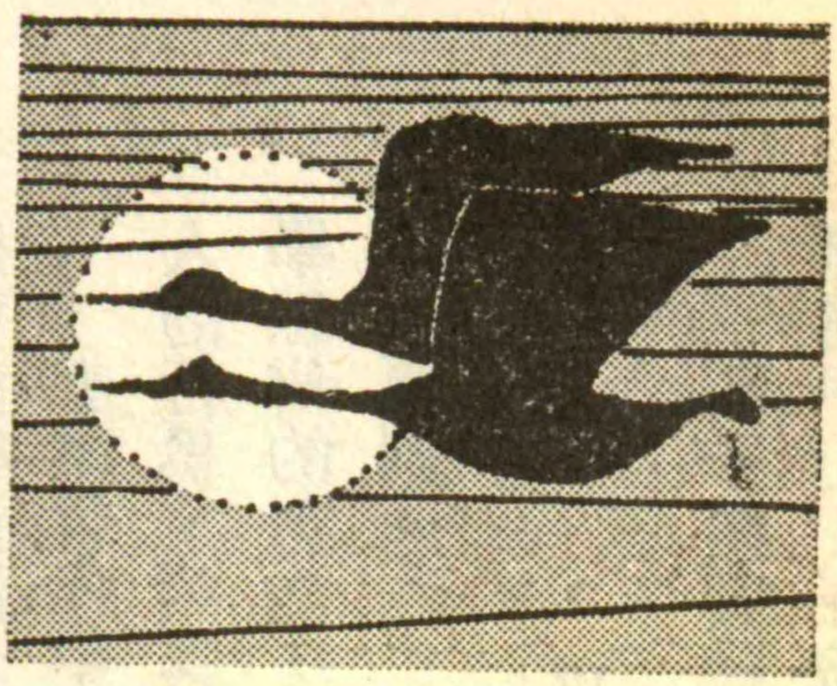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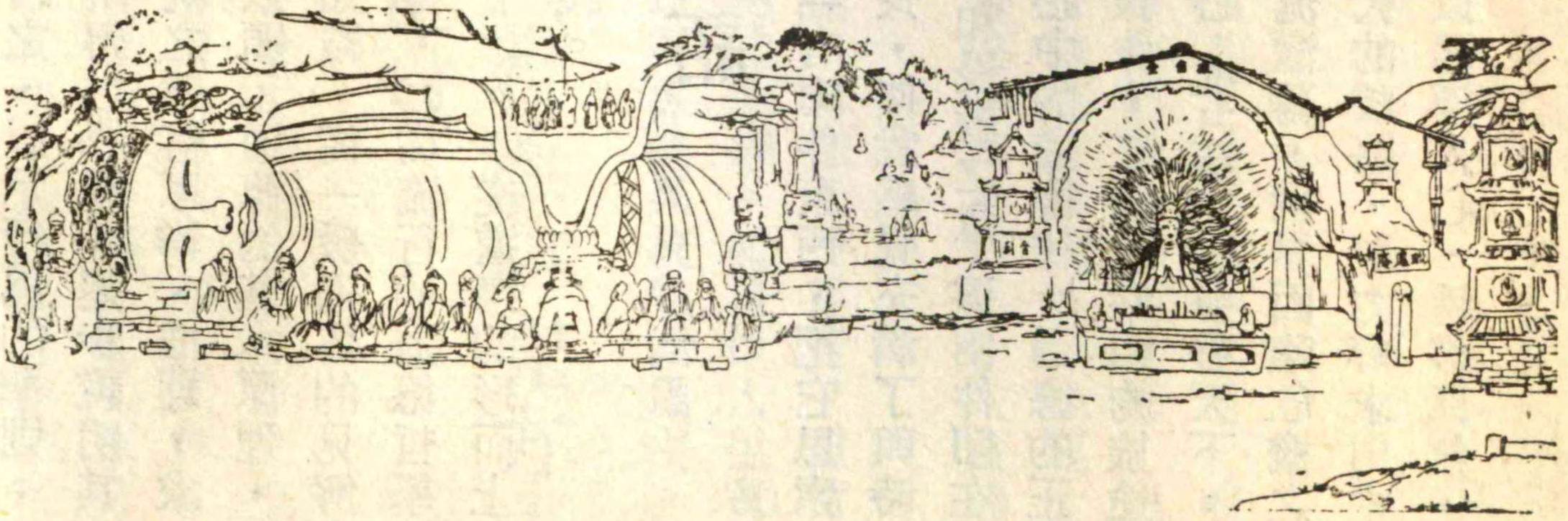
中國佛教發展史鳥瞰

成大工業研究所　葉瑞昌

在中國文獻中，對於佛法的傳入有好幾種不同的記載：最早年代，是周朝；一說印度阿育王派來中國傳教士室利房被秦始皇下獄而死，是秦時就已傳到中國。另一說則講西漢張騫出使大夏國時，印度的佛法即向中國流傳；但一般的說法，多認爲是後漢明帝永平年間的事。爲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傳說？可能是因爲佛法初輸入時，先在民間傳播，不爲史家所注意。

一、佛法輸入的年代大約在西漢末東漢初

上述諸種傳說中，學者多數認爲後漢明帝時傳入一說較可信從。相傳漢明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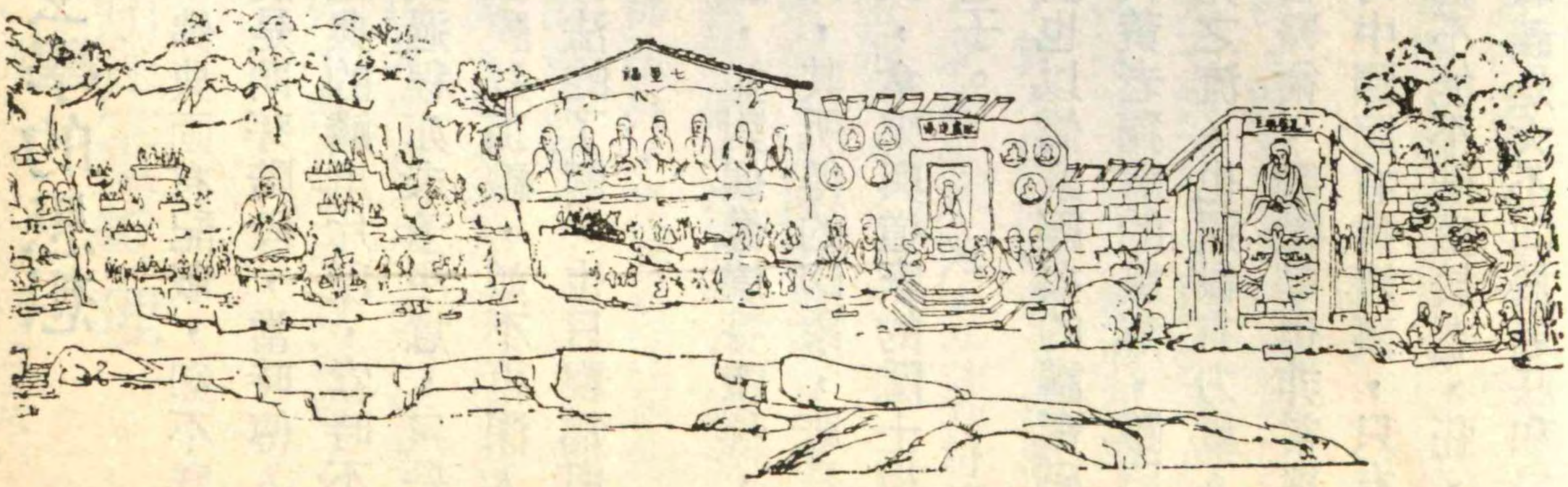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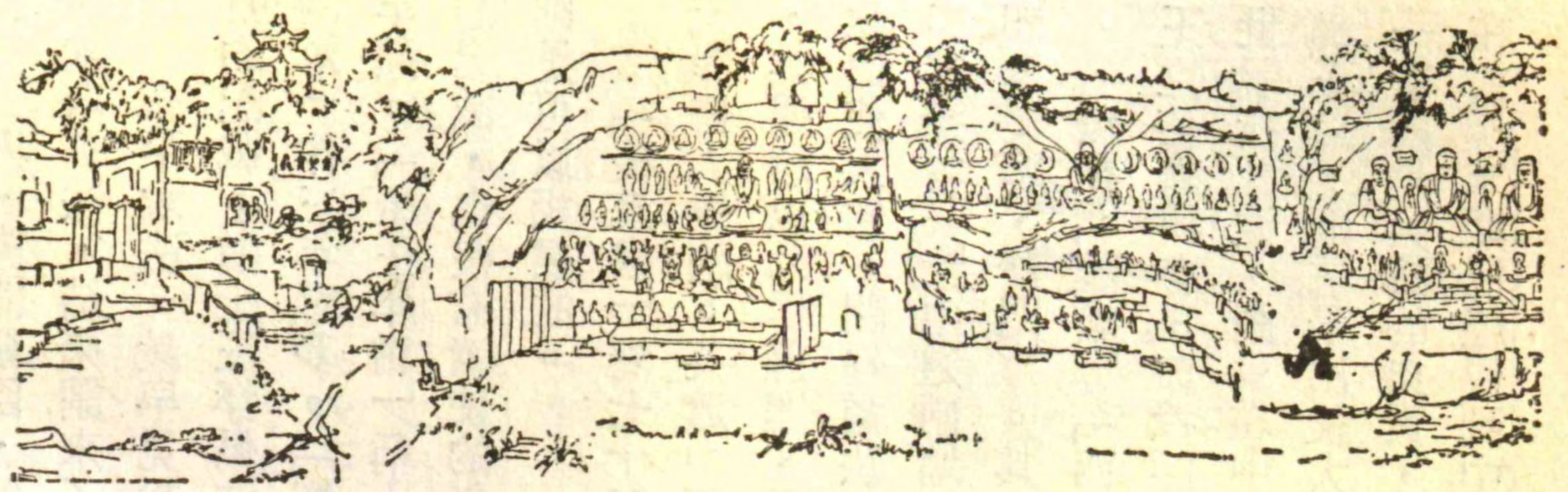
夢見金人，詢問羣臣，傅毅告以西方有聖人之教，名爲佛。明帝因派遣蔡愔赴西域求取佛法，結果請來了迦葉摩騰及竺法蘭兩位梵僧。

永平求法，最早見於牟子「理惑論」。理惑論是東漢牟融所作，沒有求法年月的記載。道士王浮僞造的「化胡經」，則謂在永平七年遣使，十八年還。「法內傳」作三年感夢。「廣弘明集」謂十年。隋費長房「三寶記」作七年感夢，十年還。「帝王年譜」稱十一年感夢遣使。漢明帝感夢的故事，又見於後漢紀卷十的記載，也沒有遣使的年月。儘管說法紛歧，不過在明帝時代佛法已傳入中國，則是可以相信的。

「後漢書」卷七十二，「楚王英傳」載：「八年（按卽明帝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中郎將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詔報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又據後漢書卷一百十八「西域列傳」：「帝於是遂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由這兩篇的記載，可見當時已有浮屠仁祠，並有伊蒲塞、桑門（按卽優婆塞、沙門）。其非僅有少數人信奉，是很明顯的。

魚豢「魏略」「西戎傳」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從大月氏王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通志、通典、畫跋、世說新語注，謂景在中國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之浮屠經；辨正論，則言景出使大月氏時得受經。受經的地點雖不相同，景盧之從伊存受經一事則是共認的史實，也可說是很有價值的根據。從這些記載裏，可以證明佛教在前漢末期已經傳到中國了。





二、後漢時代的佛法多借助於玄學的思想

佛教在西漢末年雖已傳入，但它在中國傳布的情形，卻不詳盡，其可靠性如何，尚有待今後的考證。後漢時期祇能說是萌芽階段，當時傳入之經典亦只有一些講原始小乘教義思想的譯著，和大乘經典的鱗爪片段，當時不但對於大小二乘經典義理沒有深刻的闡發，連其歷史發展過程亦未予注意，只是把釋尊說的因果報應、爲善去惡，當做一種聖經賢傳，去膜拜頂禮，並不再深入去探討這些思想的哲理。漢代黃老學說盛行，學者對於佛法的了解，也只視爲與黃老教義相似之東西。

而在一般中國人心目中，看到外國沙門穿着奇裝異服，並對偶像燒香禮拜，誦持着漢人所不懂的經文，舉行着和我國不同的宗教儀式，其所得的印象，祇是把它當方士之流看待。他們看到佛徒捨棄世俗的生活方式，拿來與道家的隱士相比擬，亦覺得沒有很大的區別，因此佛陀也被比做黃帝老子。

漢代儒家的思想雖已被當時青年學者所重視，太學裏也以儒家經典的講習研究爲中心課程，但道家思想仍然爲朝野所崇信。文景時代黃老獨尊的風氣，雖已衰落，但一派樂於隱逸生活並以老子爲祖宗之道家如嚴光之流，也還很有力量。對於不老長生神仙，講術數的和預言治亂禍福的方士，言醫術、圖讖等也非常風行，且頗受世人信仰。佛陀的教義，因爲要靠翻譯，當時中國固有書籍裏，只有老、莊、易經的用語，富於玄學的意味，佛典的辭藻也就不能不借重於老、莊、易經，因此佛法仍被視爲與老莊同途，但事實上佛法的教義是大不同於老莊和易

經的，然而事實上佛法首先却被當作與老莊相似而爲學者所接受。漢末之蒼梧太守牟融所作的「理惑論」是以調和儒、佛、道三思想爲基準，這便是後漢時中國佛法在思想界所佔的地位。

這時中國社會，又有一支新興的力量，與佛教相抗衡，就是以張陵爲首之道教——漢以前拜天祭祖的風氣，久已普遍於朝野，周代天子祭天，並以天子的祖先配天，諸侯祭社稷和宗廟，士庶人都祭自己的祖先，但這並不是一種有組織之宗教活動和團體。漢代以前的祭祀都只含有教育的意義，算不得是宗教。道教乃是假借老子學說之名融合方士派神仙之說，以吐納導引，求長生不死，此外符籙派沿襲巫覡驅鬼神的傳說，丹鼎派則藉鍊丹服藥以求長生飛昇。

東漢末年，宦官弄權，黨錮禍興，正人君子被誅夷殆盡。人民對於現實政治的改革，已經絕望，祇好馳心於現實世界外，遂發生種種迷信，這是漢代道教，所以能迅速傳播於民間的主要原因。當時宗教生活除了佛法外，是屬於迷信的範疇，而且這種迷信一直影響到後世。到唐朝，因爲政府的首領和老子同姓，道教藉政府的力量，又與陰陽五行之說混合，傳播得更深更廣。本來漢代讖緯很盛行，讖書卽是一種預言的書籍，緯書雖是解說儒家五經，但其中也含不少的怪異思想。道教和方士的思想，支配了民族的生活達數千年之久，雖然王充曾經極力破除迷信，但仍不能挽回這一時代之風氣。

三、魏晉南北朝時研習佛法已知注重哲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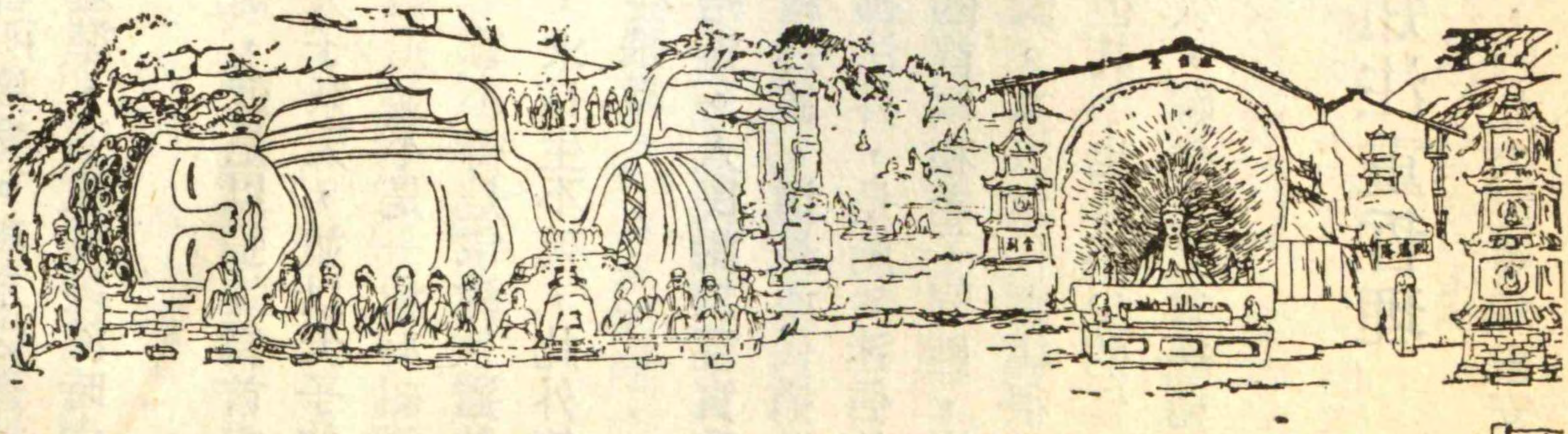
東漢末年由於時局變遷甚大，黃巾叛亂，三國爭衡，因此人民爭相求安心立

命之道，先王之禮法已不足以防閑。儒家之經世主義亦已無復能支撐世局了。另一方面又由於往昔過分尊崇經學，使不少學者生厭，而魏武倡導法家思想，又好用權術，誅除異己，司馬氏父子也喜歡摧殘士類。反動之極，清談的風氣大盛，何晏、王弼之流，大扇玄風。因此造成道佛二家對峙形勢，佛教要比道教佔優勢。

由上述種種原因所產生之結果，修仙學佛便成爲這時代很普遍的風氣。佛家與道家同樣的爭相投當時人之所好。當時由西域來的僧徒日增，如佛圖澄之於後趙，鳩摩羅什之於後秦，菩提達摩之於後魏，以及其他碩學高僧，從事於譯經宏揚教理，同時亦有不少中國僧徒遠赴西域求梵典，梁啓超根據高僧傳撰寫「一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一文，指出自漢末朱士行起至唐眞元間有近二百五十名前往西域求法，而本期之人物便佔約百分之四十。其中著名的有晉初之法護，後秦之法顯，他們皆身歷險阻，廣求佛法，其影響中國之佛教甚大，計當時由西域來的僧侶近三千，所譯內典亦甚豐富，寺院近三萬餘所，出家僧尼約二百餘萬人，這時期之佛教眞是發達。

之後，中國分成南北朝，此時中國又陷入紛亂，文化改變，宗教亦改變。南朝承東晉的風氣，多鄙棄儒術，放任清談，以退隱爲高，以曠達自命，流連佛道，而北朝雖亦崇信佛教，却不甚重老莊思想，反而尊崇儒術。南北朝對立二百年間，佛教的發展並未受影響。

南朝宋武帝曾一度想淘汰僧尼，結果反而更加禮遇僧尼。宋文帝尤篤信佛教，西域曇良耶舍，於元嘉元年至建康，敕住鍾山道林精舍，譯出「觀無量壽經」、「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求那跋摩於祇洹寺開講法華及華嚴十地品，法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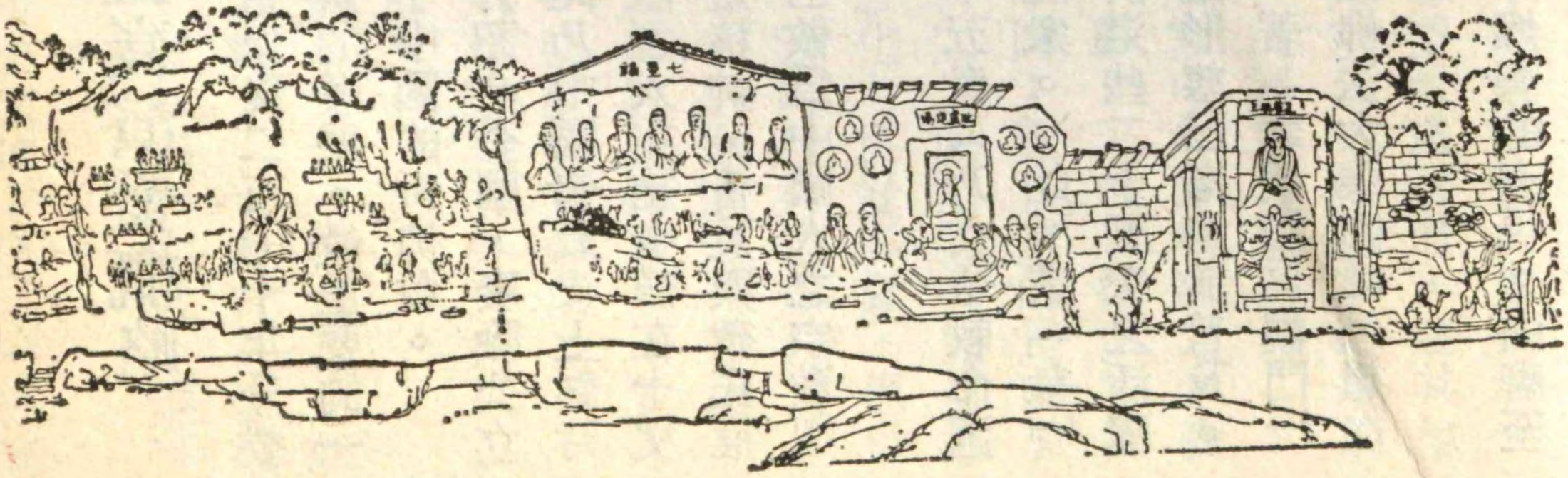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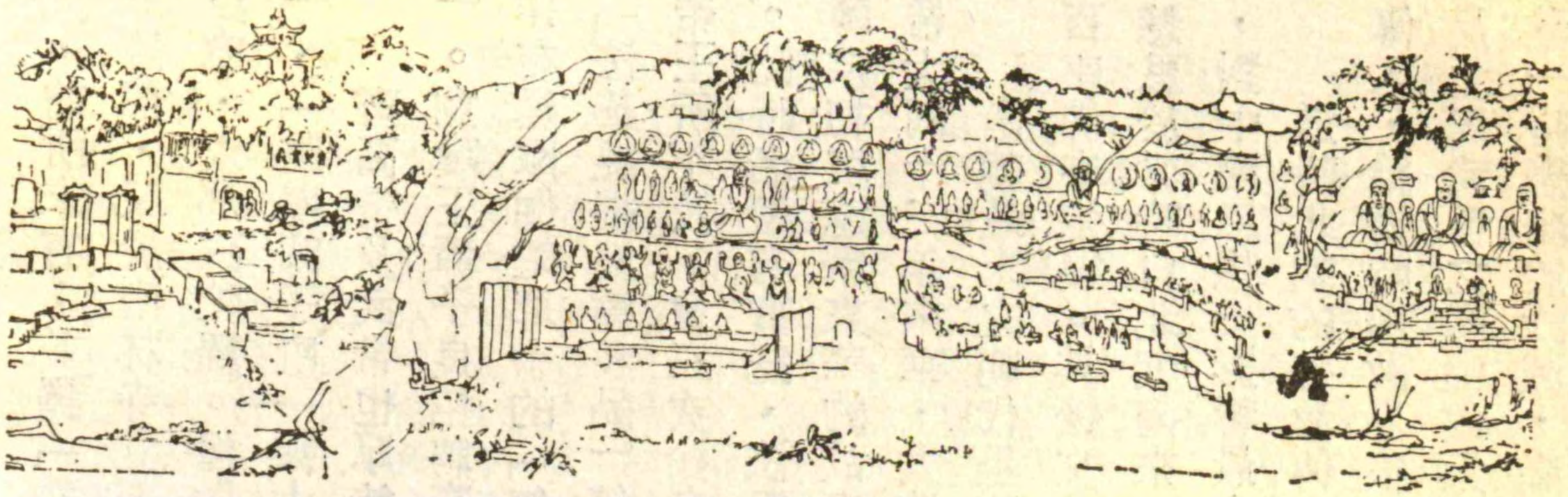
盛，前所未有；並譯「菩薩善戒經」、「曇無德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等十餘部，又於南林寺立戒壇，爲中國戒壇之始。繼求那跋摩之後來華的，有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羅。僧伽跋摩譯「雜阿毘曇心論」等，求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等一百多卷。

齊高帝及武帝也厚待佛教。高帝於建元元年親到莊嚴寺，聽僧達講「維摩經」。竟陵王蕭子良招聘高僧，並親自講授佛法，設華嚴會、龍華會等。此時之著作有曇摩伽陀耶舍的「無量義經」及僧伽跋陀羅的「善見毘婆沙」，達摩摩提的「法華經提婆達多品」等。梁武帝時爲南朝佛教最盛時期，崇信佛之虔誠爲歷代帝王所不及，曾三次捨身作三寶之奴僕，由羣臣出錢贖回，因此被稱爲皇帝菩薩。此時名僧有寶誌、法雲、傅翕、智藏、僧旻，物望都很高。「傳燈錄」還記載禪宗初祖達摩來華的故事。而眞諦三藏——這位首傳唯識到中國的大師，也於武帝大同十二年來華，太清二年到建業，曾譯出「十七地論」、金光明經等要籍。

南朝最末之朝代是陳，陳武帝也是崇奉佛教的，曾把因戰亂而毀壞之金陵七百座佛寺修復。其後文帝、宣帝，後主亦如此仿做並行捨身供養。天台宗第二祖慧思於梁時自北朝南來，到陳光大二年率徒衆入南岳，弟子甚多，其中智顗大師，對中國思想史影響最大。

這時北朝的佛教傳播也很盛，尤以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把大乘眞常的思想傳入，給當時佛教界很大的衝擊。但其中有二次令人痛心的事，乃是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之廢佛政策，寺塔被破壞，僧尼被强迫還俗，加之戰亂影響，北地佛教一時幾瀕於毀滅，幸而時間很短，後繼君主再度復興。這一時期佛法的傳播研





習和前一時期大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注重在哲理方面。

四、隋唐宋元佛教各宗派的盛衰演變概略

隋文帝合併了南朝而完成了中國統一之大業，結束東晉以後二百七十年分裂對抗的局面。隋文帝、煬帝都崇信佛教。這時佛教又有了新的發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師和三論宗吉藏大師的興起，產生了中國的新佛教。

隋文帝晚年時信仰之熱忱更加昇高，他於仁壽元年六月詔令全國，廢除公立學校，同時頒發佛舍利於諸州一百十一所，建立舍利塔，此乃中國佛教史上劃時代之創舉，但建塔費用不出於國庫而是來自全體國民，並限每人布施金額在十文之下，使得人人有參與此一行事之能力，以完成佛教平等之精神，普及與徹底推行之心願；使佛教更普遍深入於民間，同時亦反映了佛教已做爲中國人之宗教型態。

當時之佛界成立所講之五衆及四方舘，本來是成立二十五衆（乃文帝敕命選出學德兼備者、設置了所謂「二十五衆」在這同時又設定五衆。）此所講「衆」乃說能通曉三無漏學、每日登殿誦讀衆經，並且講說。由於這些二十五衆之活躍，可以想見當時全國的佛教教團內，對於經論作分科研究之形態已漸趨於普及。除了這些外還有華嚴宗的興起，杜順大師於隋開皇十三年，著「華嚴法界觀門」、「唱眞空觀」、「理事無礙觀」、「周徧含容觀」，由中國佛法大乘圓頓思想從此開展，給中華學術思想史放一萬丈光芒。

唐代文化和國力都是很盛，佛教也在這一時代，有光輝燦爛的表現。由唐至

於元朝的七百五十年間，除了原有的佛道之外，又有不少外來之宗教，如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唐太宗不獨崇奉佛教，提倡佛教，尊道教爲國教，連其他的宗教亦皆容納，如景教大德阿羅本於貞觀九年來長安，太宗命宰相房玄齡迎接留居宮中，並且替他建造大秦寺於京師，足見他對於外交手段運用的靈活。

另一方面，唐朝有少數學人認爲，出家的佛教徒，放棄家中年邁雙親之孝養及其死後之喪葬，且置家族傳統之祖先祭祀等孝道倫理於不顧；又依唐律出家爲僧尼，寺院生活和傳統所說對父母兄弟的孝悌之道，顯有不同；更嚴重的是由於可免除國民的稅賦當兵的義務。僧徒日漸增多，雖於社會教化有良好影響，但也不免影響生產及國家賦稅之收入。後來百丈創立叢林制度，即由僧徒自耕自食。

佛寺之增加，僧尼人數之衆，固然顯示佛教教團之繁榮，但過度繁榮的話，也不免要影響國家社會之均衡。因此在唐朝建國開始，對於佛教便採取了反對隋之外護政策，當時太史令傅奕爲謀富利民，上奏政策二十一條請減省寺塔僧尼，因此於唐高祖武德九年廢去不少寺廟，除了長安及地方諸州存留幾所外，盡皆被廢，僧道則命之還俗，此乃繼北魏北周之後破佛之嚴厲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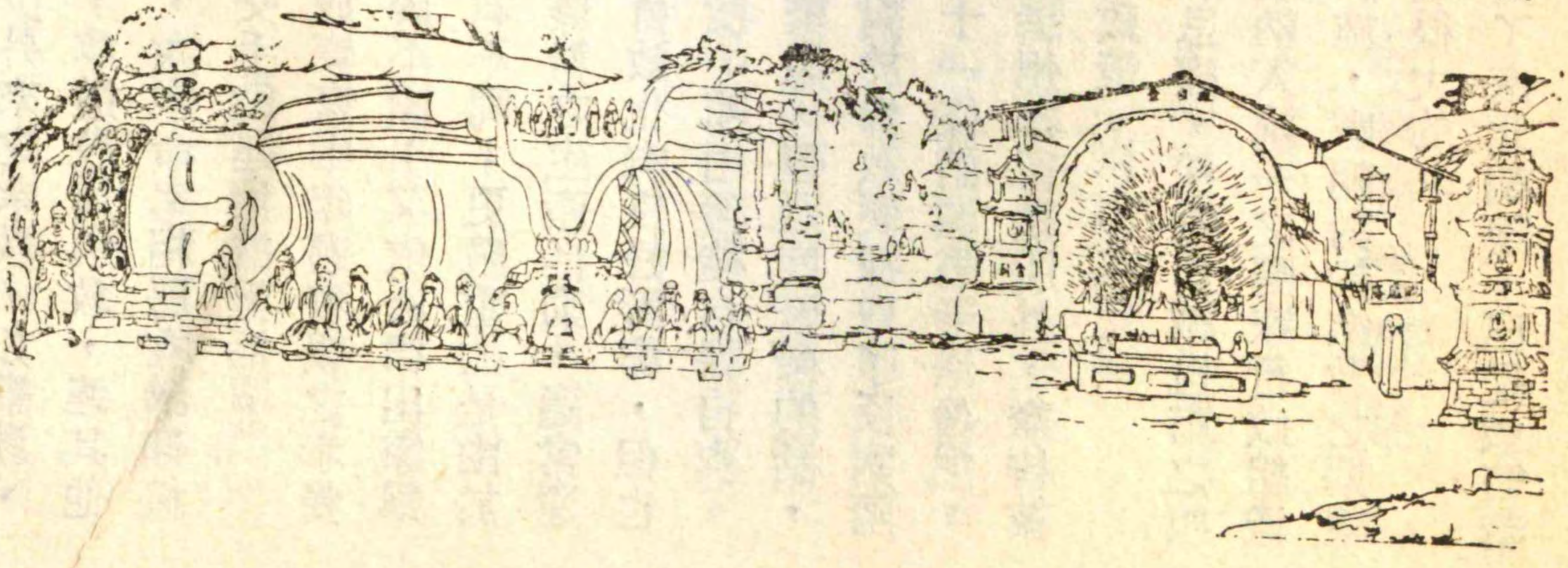
這一政策至太宗時便中止，佛教教徒亦在此時痛定思痛，採取自誡自肅之態度，竟而奠下了發展之基礎，由中央以迄各地方，予以納入統一之國家行政組織，來推行有定額之造寺、度僧和佛教儀禮，根據這些設施，唐朝對於宗教之期望及其使命之達成而言，可謂唐代佛教所給國家的協助是很大的。

佛教傳入中國，漢、魏時代可以說是萌芽階段，到了南北朝隋，已是枝繁葉

茂，參天拔地；至於唐朝更是柯條扶疏，花艷果碩，達於全盛時期。這是由於創業皇帝高祖，開始雖裁抑佛教，但不久就轉而重視佛教。及太宗卽位，因此在卽位之後馬上叫京裏之廟宇禮懺七日七夜，並且在戰陣各地建立了寺宇。在大唐內典中曾有這段記載「四方堅壘，咸置伽藍，立碑表德，以光帝業」。太宗又親自撰大唐三藏聖教序，詔令度天下僧尼，可見唐朝佛教之所以鼎盛，唐太宗之大力提倡，居功至偉。

玄宗天寶十四年，由於安祿山、史思明作亂，繼之藩鎭割據，地方政府權力提高，庶民社會抬頭，此一變化也使佛教由以長安洛陽爲中心，而向各地分散深入民間，尤以武宗會昌法難後，這一傾向更加顯著。五代十國中繼之而起的是著重於實踐的禪宗。到了宋太祖建國之初，詔令天下諸路寺院停止執行後周所頒廢毀餘額寺院之勅命，應廢而未破毀之寺院准許保留，已廢佛寺之佛像佛典等物命予移置保管；但對新造寺院以及度僧之擧，則加以限制。

到了元朝，由於防止在其支配下之漢人社會各民族反抗，因此只要在不反蒙古色彩之限度內，對於各宗教之布教活動均給予自由。元朝朝廷因佛教徒耶律楚材之得元帝寵信，與佛教之關係相當密切，尤其喇嘛教本長成於藏蒙地方，元人未入關前已多信仰喇嘛，入關以後，朝廷崇信喇嘛的風氣更盛。元代之崇佛，自世祖時代開始便急速地熱烈起來，世祖時代建立了護國仁王寺，又以大聖壽安寺爲首，相繼營建了龍興寺及華嚴寺。之後的元朝佛教在中央設有總制院作爲處理佛教及西藏關係之機構，後又改爲宣政院。這是個獨立之機構，直屬帝師。元朝之崇佛風氣又較唐宋爲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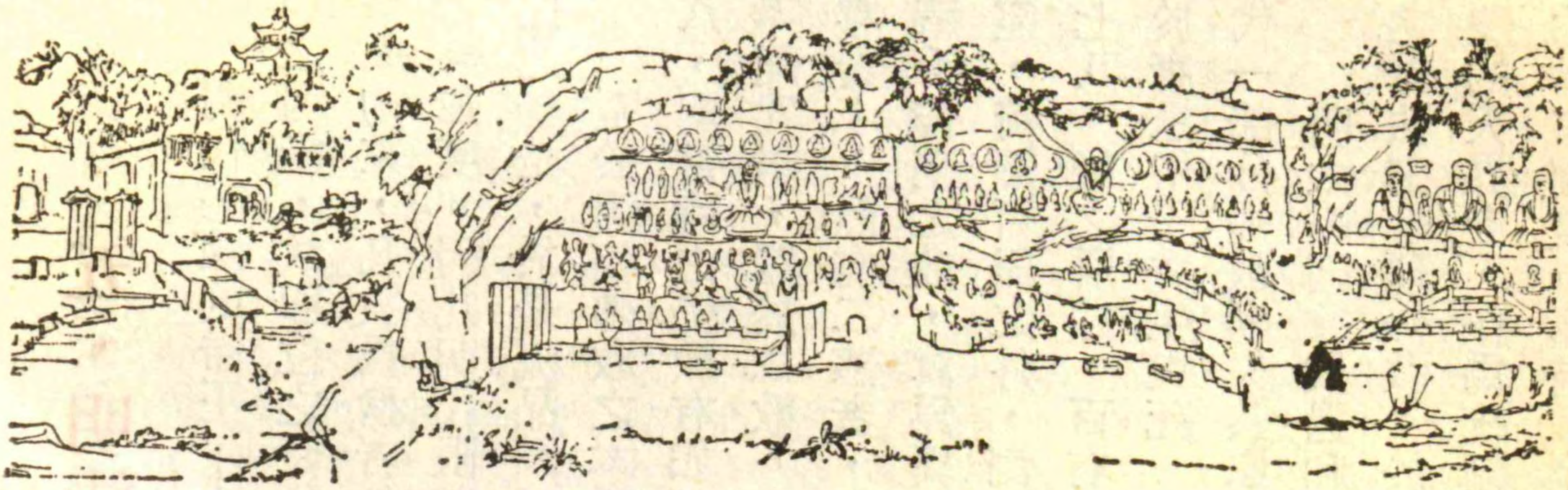


五、明清時代佛教之所以中衰的種種因由

明代開國的帝王——朱元璋，曾做過皇覺寺小沙彌，對於佛教當然有一段特別之因緣，故卽位之時便銳意振興佛教，惟鑑於元代佛教所發生的流弊，乃加以嚴厲約束，凡欲爲僧者仍沿唐宋以來的制度，必須經過考試，才給予度牒，不准私自薙度。因此明代限制僧徒出家，但游民之窮無所歸，以僧院爲逋逃藪者，仍比比皆是，於是流品漸雜。

至於明朝佛教之本質如何呢？萬曆年間有位進士謝肇淛所寫的「五雜俎」卷八，對當時之佛教有如下之評論：「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闕舍，喜者……然有二惑者，血氣已衰，死生念重，平生造作罪業，自知無所逃竄，而藉手苦空之教，冀爲異日超脫輪廻之地，此一惑也；又有不少捨大路不走却尋野徑，崎嶇百里之外，測景觀星而後得道，自以爲奇，此又其一惑。前之所惑什常七八，後之所惑，百有二三。其於釋氏宗旨，尚未得其門，況敢窺其堂奥哉？至於庸愚俗子貪生畏死，妄意求福，又不足言矣。」我們由上述之記載，便知道明代一部分佛教漸失其原有性質了。

明太祖因曾做過和尚，本想振興佛教，但又恐流於元朝之流弊，因此便巧妙之方法來管理佛教。於是在洪武元年，倣效元朝宣政院的制度，設立善世院於金陵的天界寺，作爲統制佛教的總機構，並且定下了統領、副統領、贊領、紀化等的僧官制度。當時成爲第一代統領的乃是慧雲，敍從二品，由此可見太祖之佛教



政策之動向，不僅以利於國家的進展，作爲公許佛教之存在條件，且亦表示了並未逸出中國傳統以儒教立國之原則。

太祖後之成祖永樂帝在靖難之變以後，爲了收攬民心，遂御製「神僧傳」九卷，「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五十一卷，「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四十卷，另外頒佈了「仁孝皇后勸善書」及「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凡此皆爲收攬民心之一種政策，同時亦反映了明代帝室對於佛教信仰之實際狀態。

到了清朝，由於它是文化低落之異族，爲了統治具有高度文化之漢民族，便實施了各種剛柔不同之政策，除其自身信奉之喇嘛外，對其他宗教之統治政策却頗嚴厲，因此對比儒道二教隆盛之佛教，更予以强烈之攻擊。清代諸帝（包括滿洲時代在內）對於佛教，乃本著理番政策之立場。如雍正帝之將其爲皇太子所居之宮殿改成佛教寺院——亦就是北京有名的喇嘛寺雍和宮，自號圓明居士，其實他是持佛道一貫之思想。

順治時代按明代之宗教制度設立了僧官，自中央至地方，分別設置了僧錄司、僧正司、僧會司，然而僧官之最高地位是僧錄司之長官，只有正六品，至於其他僧官地位便更低了。佛教之教團受著如此低階地位，嚴格限制寺院之新建與出家得度及僧尼之行爲，在這樣法制下之佛教，失去了宗教活動之自主性。後來又因於雍正帝廢止歷代要出家須先經政府考試合格，並應先徵得父母妻子同意之法令，人民可以自由出家，由是僧尼流品日雜，至於不識字，或犯罪的人也雜處其間，造成了輕佛之邪風，因而破壞了社會對於佛教之尊敬，沙門被視爲方外之民

，遂形成爲佛教的低潮時期。

六、民國肇建迄今佛法已開啓復興的契機

由於漢民族之覺醒，而推翻了滿洲王朝之統治，建立了以漢民族爲中心之中華民國，楊仁山、歐陽竟無、梁任公與很多學者提倡佛學，北平和金陵都有刻經處，大藏經也經翻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都開印度哲學課程，在此時期，佛教漸有復興的趨向。不過仍有一部分知識分子自以爲適應時代要求，而爲設立新教育機構上著眼點上，便企圖將寺廟改辦學校提倡所謂廟產興學，震撼了整個中國之佛教界。同時又有土豪劣紳趁火打刼，公然兼併廟產。民國初年在政治、思想、文學等之急劇轉變之社會中，不但常有人覬覦寺院及其財產，並且顯著地出現一種思想，認爲在此新了統一全國之大業，中國佛教會於民國二十五年在國民黨中央之指導下改組成立了統一全國之大業，中國佛教會於民國二十五年在國民黨爲現代國民一分子之僧侶，有關其社會地位，却也要自加切實檢討及反省了。這對於中國佛教之近代化有著很大之激發作用。

民國時代以還，佛教大師首推太虛和尚，他廣興佛法教育，並主張改革僧伽制度。近二十多年來，很多高僧到美國南洋各地弘揚大乘佛法，中國佛教正在逐漸邁向復興之路途。不幸抗日戰爭發生後，太虛和尚歷年之苦心結晶幾付東流。抗戰勝利後，太虛回南京已罹病，遂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圓寂於上海玉佛寺，他竟未見中國佛教之復興，乃是相當悲痛之事，更是整個中國佛教界一大損失。